悦读丛书

浙江省社科规划一般课题（科普读物）

19KPCB02YB

浙江海洋文明史话

白斌 顾苗央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白　斌，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任教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主要从事中国海洋经济史与世界海洋政策比较研究，代表作为《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

顾苗央，就读于宁波大学人文教育（师范）专业，曾参与宁波市社科基地课题“民国时期宁波海洋渔业团体研究”。

浙江省社科联人文社科出版重点资助项目
浙江省社科规划一般课题(科普读物)-19KPCB02YB

浙江海洋文明史话

白　斌　顾苗央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海洋文明史话 / 白斌，顾苗央著. —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0.6

ISBN 978-7-5178-3784-8

Ⅰ. ①浙… Ⅱ. ①白… ②顾… Ⅲ. ①海洋-文化史-研究-浙江 Ⅳ. ①P7-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50232号

浙江海洋文明史话

ZHEJIANG HAIYANG WENMING SHIHUA

白　斌　顾苗央　著

责任编辑　张晶晶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红羽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全能工艺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300千

版 印 次　2020年6月第1版　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3784-8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序

中华文明从地域上讲可理解为农耕文明、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诸多学者认为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而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由来，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在其影响过程中逐渐与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共同组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华文明。从演变路径上可以看出，中国的海洋文明是农耕文明在向海洋延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西方国家的农耕文明则是海洋文明在向大陆扩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形成路径的不同使得中国的海洋文明与西方国家的海洋文明有着不同的发展特征。

首先，中国的海洋文明是农耕群体向沿海及海洋延展中逐渐形成的，其天然具有农耕文明的

特征。浙江海洋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建立在中原地区移民与沿海土著居民逐渐融合的基础之上的，其群体向海洋的延展更多的是由于人文地理环境恶化之后的被动选择，而不是主动地走向海洋。换句话来讲，中国海洋文明范围的拓展是建立在中原地区战乱和区域人地矛盾基础之上的。前者使得大量北方士族南下移民到浙江沿海，带来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地方治理模式及农耕文明传统；后者则迫使大量沿海群体向海洋延展，从沿海到海岛，再到海外，沿着海洋贸易航线逐步向外移民，其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与文化习俗构成了中国海洋文明的轮廓和海洋文化的主要元素。

其次，中国的海洋文明是在农耕政权扩展治理范围中逐渐形成的，海洋文明的发展过程，一直受到以农耕思想为主体的国家机器的制约和限制。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秦汉等政权逐渐完成了对中国沿海地区的政治治理。在海洋经济萌芽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央政权对海洋的态度更多的是放任和有限管理。随着中国沿海经济的发展与海洋活动的日趋频繁，特别是中国经济重心向南方的转移，国家日益重视对海洋活动的管理。宋元时期，除海洋盐业活动外，海洋贸易也逐渐纳入国家管理范畴，朝廷还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和规范海洋贸易活动。不过明清时期，随着中国边疆与海疆问题的日益严重，在国防力量有限的制约下，国家对海洋的管理日趋保守，海洋贸易活动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而从晚清以后，随着国家的对外开放及确立了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目标，海洋经济的开放式发展成为政治共识。

最后，中国的海洋文明是在农耕文明向海洋延展并适应

海洋人文环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中国海洋文明社会与农耕文明社会的紧密关系使人很难区分两者的边界。不少从事捕捞的渔民本身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完全从事海洋生产活动的群体，在中国海洋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大一统的政权也使得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受到交通的限制，国家级的水运和陆路网络使得中国沿海与内陆的人员流动频繁，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海洋文明很多都拥有农耕文明的特征。

看了白斌博士的新作《浙江海洋文明史话》，对他书中所涉猎历史视角的浙江海洋管理相关研究成果颇为赞许之时，也想起七年前的往事。我和白斌博士相识于2012年秋季，当时他协助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海洋文化年会，并通过中国海洋大学与我取得联系，向我约稿。可惜的是当时因为时间冲突没能去宁波参加年会，但白斌博士之后一直与我保持学术联系。第二年，在时任中心主任张伟教授的邀请下，我拜访了宁波大学和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和白斌博士进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他对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热情与执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这本《浙江海洋文明史话》，正是白斌博士不忘初心的一份见证。

2019年，我所在的单位天津大学海洋战略研究所获批一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题目为中国海洋遗产研究。中华民族沿海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与海洋开发过程中留下了丰富而有价值的海洋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再加上独具特色的海洋人文景观和水下沉船文化遗产，构成了中国海洋文明史的历史基础。我国是正在日益走向世界中

心的陆海大国，深入探索与挖掘海洋文化遗产，对于彰显我国海洋大国和文化遗产大国的地位，从文化自信角度力证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海洋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都是必要的。而白斌博士的新书《浙江海洋文明史话》，应该说是近十年来浙江海洋文明研究成果的集成，他在书中用通俗的语言展示了浙江海洋文化遗产的内容，并以专题的形式展示了海洋文明的立体形象。我很欣慰在我们努力建设海洋强国的今天，中国海洋文明的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尤其是不断涌现出许多具有典型地域特点和综合发展视域的海洋文化研究成果。白斌博士作为一名青年学者，能够淡泊明志，默默耕耘于此中，亦谓之难得。我在向他表示祝贺的同时，也随笔写了这篇简单小文表达想法。

应白斌博士之邀，是为序，不登大雅，聊表关切。

刘家沂

于天津大学海洋战略研究所

目录

1 引 言

5 第一章 **浙江海洋渔业盐业管理**

第一节 浙江海洋渔业管理 7

第二节 浙江海洋盐业管理 17

29 第二章 **浙江海洋贸易与航政管理**

第一节 浙江海洋贸易管理 31

第二节 民国时期浙江航政管理 44

61 第三章 **浙江海洋渔业经济**

第一节 古代浙江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63

第二节 民国时期浙江海洋渔业的转型 74

85 第四章 **浙江海洋盐业经济**

第一节 古代浙江海洋盐业的发展与繁荣 87

第二节 民国时期浙江海洋盐业的转型 96

109 第五章 **浙江造船业与临港经济**

第一节 古代浙江造船业的发展与繁荣 111

第二节 晚清民国时期浙江的临港经济 127

141 第六章 **浙江海洋贸易与航运**

第一节 古代浙江海洋贸易与航线 143

第二节 晚清民国时期浙江海洋贸易与航运 159

179 第七章 **浙江海洋交通与群体生活**

第一节 浙江沿海交通与人口流动 181

第二节 浙江沿海群体生活与文化交流 203

224 **参考文献**

227 **后 记**

引　言

浙江海洋文明的演变漫长而又丰富多彩，其发展演变包含诸多分支和内容，其中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国家海洋政策变化、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和多元海洋文化构成了浙江海洋文明的框架和主体。

浙江海洋文明孕育和发展的基础是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浙江东靠大海，北部宁绍平原和杭嘉湖平原隔钱塘江相望，南部台州和温州沿海则多为山地。浙江沿海丰富的海洋生物与矿产资源使得早期浙江沿海先民在不断的尝试中逐步扩大对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盐业资源的利用，以海洋捕捞为主的海洋渔业经济与以海洋制盐业为主的海洋盐业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规模。浙江沿海境内河流大多自西向东流入太平洋，这使得早期浙江沿海的交通多以水运为主。唐宋时期，浙江修建了与京杭大运河相配套的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自此，浙江沿海的货物或直接通过海运运往杭州港，或运往宁波通过浙东运河转运杭州，再走江南运河转往长江流域及沿运河的北方各省。独特的航运特征使得宁波渐次成为浙江最大的沿海港口城市。近代以来，随着现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浙江沿海传统的帆船业并未出现衰退，而是和现代航运方式一起构成浙江沿海人员与货物流动的载体。在推动沿海城市发展方面，海洋贸易与航运的贡献非常突出，大量沿海城市与市镇都是在港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其城市规模的。其中的温州和台州也是在港口与海洋贸易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推动了区域城市的

建设。浙江早期人口主要是越人。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浙江的开发，大量中原族群开始向浙江沿海迁移，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秦汉与宋元时期，因中原地区的战乱使得大量北方士族南迁，不少望族迁移到浙江沿海并定居下来。浙江沿海人口的增加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也孕育了丰富的海洋文化。整体而言，浙江沿海人口的迁徙是从浙北向浙南再向浙东沿海逐步扩散的，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呈现出与人口扩散基本一致的态势。明清时期，浙江沿海人多地少的压力使得不少人从事海洋贸易等涉海经济活动，也使得部分人漂洋过海前往东南亚及更远的地方寻求发展。这种在生活压力下的被迫迁徙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才逐渐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晚清以后，不少地方士绅面对时局的变化，纷纷将子女送出国学习，其留学地有最早的欧美国家，也有后来的近邻日本。这种主动适应社会变化的特征使得浙江商帮在近代逐渐崛起并影响国家的发展方向。

国家海洋政策的变化是浙江海洋文明演变的另一条主线。中国早期的海洋政策对居民海洋活动整体是持放任的态度，特别是在浙江沿海还未完全开发的秦汉时期，政府对浙江沿海的管控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无论是海洋贸易还是海洋资源利用，在未规模化之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基本都是不加干涉的。除此之外，政府往往会组织大规模的船队从事海上贸易，探索海上航线，为区域海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以降，浙江沿海贸易的发展与海洋盐业的开发，使得国家开始设立专门机构来管理浙江沿海经济活动。不过这一时期的管理更多的是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服务的，这一点在唐代对浙江沿海的盐业管理和盐政改革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宋元时期，政府开放性的海洋政策极大地鼓励了浙江海洋贸易的发展。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到海上贸易活动当中。以官方为例，除了加强对海洋进出口货物和人员的管理，更是通过建设强大的海军来维护

海上秩序，为私人海上贸易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政府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建造大型海船走访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一方面加强外交联系，另一方面探索安全的远洋贸易航线。明清时期，由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和沿海海防问题，国家海洋政策趋于保守，私人海上贸易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家对海洋的管控也在逐渐收缩。纷乱的海上秩序和多如牛毛的海盗不仅严重威胁海洋贸易，也对近海渔业与盐业生产造成破坏。在生存压力下，更多的人被迫违反海洋禁令从事走私贸易，更有不少人受胁迫或主动参与海盗活动。这种海洋秩序的混乱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才逐步好转。

海洋经济发展是影响浙江海洋文明演变所不可或缺的内容。浙江沿海活动大多是围绕经济活动展开的。早期浙江沿海先民的活动都是基于生存的需要，将其活动的足迹从海岸线向潮间带、近海和远洋逐步扩展的。浙江沿海人口的扩张也按照这一顺序自北向南延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除了专门从事海洋盐业生产的盐民，大多数参与海洋渔业捕捞与海上贸易活动的群体都同时从事沿海的农业生产。在海洋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人口规模与土地承载量的矛盾还未严重激化之前，不少在浙江沿海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在农闲时期也参与海洋渔业捕捞等海洋经济活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半耕半渔”。直到现在，在浙江沿海及岛屿上的许多从事捕捞的渔民也同时兼顾农业生产。不过与早期只种植水稻所不同的是，明清以后，浙江沿海的农业生产相当一部分种植的是红薯、土豆、南瓜和玉米等可以在较恶劣环境下生长的农作物。随着人口的增加与人地矛盾的激化，自明代中期开始，相当一部分浙江沿海居民开始从事专业化的海洋渔业生产与海上贸易活动，这就是所谓的“靠海吃海”，这种情况在多山少地的台州和温州沿海区域更为突出。与海洋盐业生产由政府直接管理所不同的是，海洋渔业与海洋贸易活动的主体都是私人。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与

海洋造船业的逐渐式微相反，浙江海洋渔业与海洋贸易在政府严格的海洋政策下其规模与产值仍呈上升趋势。不过遗憾的是，在失去与其他国家直接从事海洋贸易的资格后，浙江以港口贸易为主体的临港经济尽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无论其速度还是规模都开始逐渐落后于紧靠长江口的上海。宁波港至此逐渐失去了长三角区域海洋贸易港口的主体地位。这种港口地位的变化在近代对浙江沿海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上海的虹吸效应下，以宁绍商帮为主体的浙江商帮将经济活动的重心转移到上海。在浙江金融资本的支持下，大量企业和服务行业在上海建立，不少浙江沿海居民及相关人才纷纷移居上海。近代浙江海洋渔业、海洋造船业与海洋贸易现代化的艰难与此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在浙江沿海从事现代海洋渔业生产的渔轮大多来自上海，现代化的轮船运输企业也大多来自上海，浙江沿海贸易产品也大多通过上海中转出口到世界各地。

第 一 章

浙江海洋渔业盐业管理

渔和盐，作为传统中国最早的海洋资源，历代政府对沿海渔业与盐业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态度差异甚大。直到20世纪初期，浙江乃至中国在海防压力及海权纠纷下才开始逐步设立海洋渔业的管理机构，并在民国时期日渐完善。不过由于政府更迭，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政府渔业管理机构在浙江海洋渔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仍不甚重要。整个民国时期，浙江海洋渔业管理机构的职能和职责仍在不断探索之中。与之相反的是，作为与民众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盐业在战国时期就被纳入政府管理体制之中。自秦汉以来，无论是海盐还是内地出产的食盐，都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其管理模式已然成熟。民国后，盐税更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浙江而言，盐业管理分为行政和稽核两个系统，更有盐税警察防止私盐贩卖。在政府海洋管理体制中，海盐管理一直是重中之重。

第一节　浙江海洋渔业管理

中国渔业政策及渔业经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当时出现了管理渔业的官员。在唐代，山东、浙江等地的海洋渔业经济较为发达，其出产的水产品每年都要作为贡品运往京师，但由于中国大陆农业经济的主体模式，涉及海洋渔业政策的出台却要到唐代以后。作为盐铁专卖的一部分，海盐的管理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对沿海渔民的管理也和内地居民一样，以保甲制度的形式将其纳入国家人口管理体系当中。一直以来，海洋渔业政策都是作为附属内容隐含在盐铁政策、户籍政策、海防政策之中的。就海洋渔业界而言，独立海洋渔业政策出现的时间当在明代中期，政府针对出海捕鱼船只从政策上进行规范，而真正出现管理海洋渔业的专职部门要到1900年之后。1904年江浙渔业公司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引进外来海洋渔业政策以推动渔业经济现代化尝试的开始。民国时期，浙江海洋渔业管理最初是由国民政府实业部渔牧司主导，具体活动是推动渔民自身组成团体在进行海洋作业时保证自己的安全。同时，实业部渔牧司也积极推动现代海洋渔业技术的革新和渔业公司的组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浙江省建设厅积极推动浙江渔业合作社事务，以期改善浙江沿海渔民的生计，保持社会稳定。实业部则从渔业生产技术推广、水产品流通、渔业金